

不稳定就业与新职业群体市民化 研究：以骑手为例^{*}

田志鹏

【摘要】城市服务业新业态为农业转移劳动力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但其更加灵活的用工方式也对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构成潜在挑战。本文以骑手为例，研究从业者的就业稳定性与其市民化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基于“全国新职业青年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客观层面，相较于与平台签订合同的骑手，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骑手市民化的可能性更高，而收入和社会保障对其市民化倾向无显著影响；在主观层面，预期失业风险越低的骑手市民化的可能性越高。本研究结论表明，对于推动当前新职业群体市民化，雇佣确定性比保障完善性更加重要，因而在优先推动雇佣正规化的同时提供适度社会保障是新业态就业制度改革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新职业群体 不稳定就业 市民化 骑手

【作者简介】田志鹏，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 - 1125 (2022) 11 - 0090 - 14

一、引论

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我国进一步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基

* 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会质量基础数据库建设”（16ZDA079）、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重点学科发展社会学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指标综合集成实验室等项目的支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课题组提供的“全国新职业青年调查”数据，感谢匿名审稿人和编辑提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础，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吸纳新增就业人员的能力日益下降，而以互联网平台经济为基础的服务业新就业形态成为创造新增就业机会的重要渠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大量增加的城镇就业岗位并未带来城镇化率的显著提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比上年末提高0.83个百分点。^①这其中固然有城市高房价的影响，但也应看到，相比雇佣模式更加制度化的传统劳动者，城市新职业群体不稳定的就业状况不仅会直接影响其定居城市的收入预期，还会通过金融信贷间接影响其在城市购房安居的能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小型城市完全放开落户限制，生活成本与就业收入已成为决定劳动者去留城市的基本因素，推动城镇化进一步发展势必要在降低生活成本和提高劳动收入这两方面发力。单从就业收入看，新职业群体的平均收入并不低，这也是新职业群体迅速扩大的根本原因，以送餐员为例，调查表明大部分送餐员月收入超过3500元。^②由此引出一个现实问题：为何我国的城镇化率并未随着新职业群体的扩大而快速上升？除了关注以房价为核心的生活成本问题，新职业群体的就业特征对其市民化可能性的影响同样十分值得关注。现有研究广泛关注了新职业群体在收入、社会保障、法律地位、劳动技能、工作灵活性等方面的新特征^③，但很少有研究深入探讨上述特征与新职业群体市民化之间的关系。

从理论上讲，对于进城务工人员而言，落户城市意味着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这一决策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相应地，除了短期高收入，稳定的就业预期对进城人员的落户决策同样具有重要影响。骑手是城市新职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该群体的就业稳定性与其市民化倾向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明确新职业群体的就业特征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本文从就业驱动的城镇化视角出发，将市民化倾向界定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预期未来留居当前城市而非返回家乡工作的可能性，重点关注了收入、劳动合同、社会保障与失业预期这四个方面的就业状况对新职业群体市民化倾向的影响。通过使用全国代表性数据检验上述因果关系，本研究厘清了新职业群体就业状况影响其市民化倾向的具体机制，对于进一步做好城市新职业群体的就业工作与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202/t20220228_1827971.html，2022年3月10日。

② 参见邱婕《灵活就业：数字经济浪潮下的人与社会》，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版，第84页。

③ 参见张成刚《就业变革：数字商业与中国新就业形态》，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版，第51~65页。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新职业群体的市民化研究

目前学界对于“新职业”尚无统一的定义。有学者从新经济出发,认为“新职业是指在新经济背景下,为适应数字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美好生活需要而存在的各种专业化、技术化、个性化职业”。^① 在新经济的背景下界定新职业,尽管可能遗漏一些新职业,但反映了数字经济发展催生大量新职业的重要事实。也有研究从政策层面界定新职业,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5—2021年颁布的56个新职业类型确认为新职业。^② 这样的界定方式更具体,也更容易操作,但由于政策层面对新职业的认可存在滞后性,以此界定新职业可能遗漏某些尚在成长中的新职业类型。

本质上说,新职业是相对于传统职业而言的,从发展的角度看,现在的新职业也会变为传统职业。因此,在界定“新职业”的内涵时,如果超出时间维度上的“新旧”,很可能纳入一些互有矛盾的维度。例如,从2015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职业类型看,其中既包括专业技术人员,也包括生活服务人员和生产制造有关人员。有研究者注意到了新职业群体的异质性,指出新职业“既包括传统雇佣关系没有改变的新职业,又包括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催生的新就业形态”。^③

现有研究关注了新职业与经济循环^④、经济增长^⑤、新型劳动关系^⑥等方面的关系,较少有研究关注新职业对城镇化的影响。尽管新职业群体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不存在市民化的问题,但新职业群体中占比很高的网约配送员、互联网营销师、互联网平台家政工等仍旧面临着市民化的问题。

① 邓忠奇、程翔、张宇 《中国新职业发展现状及从业者工作满意度研究——基于双维度微观调查数据》,《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12期,第54页。

② 参见丁述磊、张抗私 《数字经济时代新职业与经济循环》,《中国人口科学》2021年第5期,第105页。

③ 戚聿东、丁述磊、刘翠花 《数字经济时代新职业发展与新型劳动关系的构建》,《改革》2021年第9期,第67页。

④ 参见丁述磊、张抗私 《数字经济时代新职业与经济循环》,《中国人口科学》2021年第5期,第102~113页。

⑤ 参见戚聿东、丁述磊、刘翠花 《数字经济时代新职业促进专业化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机理研究——基于社会分工视角》,《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58~69页。

⑥ 参见戚聿东、丁述磊、刘翠花 《数字经济时代新职业发展与新型劳动关系的构建》,《改革》2021年第9期,第65~81页。

已有研究深入探讨了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①，部分新职业群体的市民化问题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有相通之处，但也存在明显不同。例如，大部分送餐员属于流动到城市的农村户籍人员^②，符合农民工的身份定义，但其工作特征与传统从事生产制造的农民工存在很大差别。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许多送餐员其实是从传统制造业中流出的，但这一职业转变对城镇化的影响也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鉴于新职业群体构成的复杂性，且该群体的就业方式与农民工存在明显差别，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新职业群体中的代表——网约配送员（俗称骑手）。网约配送员的职业定义如下：通过移动互联网平台等，从事接收、验视客户订单，根据订单需求，按照平台智能规划路线，在一定时间内将订单物品递送至指定地点的服务人员。^③从社会现实看，网约配送员的主体是“骑手”，数据表明，截至2021年底，骑手的人数规模在1300万左右^④，一些平台骑手达到400多万人。^⑤研究骑手的市民化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新职业群体市民化机制的理解，也为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二）新职业群体的就业状况与市民化机制

由于以骑手为代表的平台就业在新职业群体中占比很高，新职业群体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收入水平较高、就业稳定性较低。从全球范围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出现的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工作状况与其二战后三十年相对安全的工作状况形成鲜明对比，所谓“不稳定工作”是指从工人的角度来看是不确定的、不可预测的和有风险的就业。^⑥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我国不稳定就业也表现出“常态化”趋势，以“非正规就业”统计为例，数据表明，2018年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规模达

① 参见刘传江、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人口研究》2008年第5期，第48~57页。

② 参见邱婕《灵活就业：数字经济浪潮下的人与社会》，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版，第89页。

③ 参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职业——网约配送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yaowen/rsxw/202009/t20200923_391259.html，2022年3月10日。

④ 参见刘萌萌《1300万外卖骑手，从“零工”走向“职业”》，<https://www.tmtpost.com/6007454.html>，2022年3月10日。

⑤ 参见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局长就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http://www.stats.gov.cn/xgk/jd/sjjd2020/202202/t20220209_1827283.html，2022年3月10日。

⑥ 参见Arne L. Kalleberg, *Precarious Work, Insecure Workers: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4 (1), 2009, p. 1.

26459.07万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60.94%。^①从宏观层面看,新职业群体不稳定的就业状况是上述社会变迁的一部分。

有关不稳定就业社会影响的理论研究表明,由于工作日益表现出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新进入城市的人口可能无法在城市扎根。^②目前我国有关新职业群体不稳定就业与市民化的研究较少,关于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证研究可以提供一定参考。有研究指出不稳定就业虽然有助于提高农民工个体的工资水平,但是不利于其家庭成员随迁,导致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悖论。^③由此可以推论,对于以配送员为代表的新职业群体,其不稳定的就业状况也可能通过影响其家庭成员的随迁,进而影响其在就业城市落户、安家的意愿。

在不稳定就业的测量上,尽管学界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离散型测量和连续型测量。离散型测量是通过确定不稳定就业的基本特征,将出现这些特征的就业状况视作不稳定就业,如有研究将“出现无养老保障、非全职工作、无固定雇主中情况的任意一种”^④的就业状况视为不稳定就业。连续型测量一般使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实现多维度就业状况的简化,以此形成一个衡量就业稳定性状况的连续型变量。例如,有研究在分析骑手就业状况时,综合考虑了社会保险、专业技能、失业预期和劳动收入等多个维度。^⑤不同研究者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具体指标的选择上,测量方式上的差异是次要的。

应当承认,不稳定就业测量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对于其所造成社会后果的评估。综合考虑现有研究对就业稳定性的测量,本文确定了收入、劳动合同、社会保障和失业预期四个基本维度,前三个维度侧重客观层面,最后一个维度侧重主观层面。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并未将上述四个维度简化成一个综合性的就业稳定性指标,而是分别考察这四个维度对新职业群体市民化的具体影响。这主要出于以下三点考虑:一是综合性指标无法呈现出就业稳定性不同维度对市民化影响的差异;二是对于

① 参见赵新宇、郑国强《劳动力市场扭曲与非正规就业——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实证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4期,第163页。

② 参见 Arne L. Kalleberg, *Precarious Work, Insecure Workers: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4 (1), 2009, p. 10.

③ 参见石智雷、刘思辰、赵颖《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社会》2022年第1期,第88~123页。

④ 刘爱玉《脆弱就业女性化与收入性别差距》,《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123页。

⑤ 参见崔岩《就业质量视角下的外卖骑手就业脆弱性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96页。

骑手等新职业群体而言，高收入与雇佣确定性之间的关系更弱，甚至存在反向关系，而综合指标假设收入具有单一的正向影响；三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骑手群体对于合同与保险可能存在一定误解，将其简化为综合指标可能会混淆某些影响。

总结而言，本文在“不稳定就业”框架下研究主要就业特征对新职业群体市民化过程的影响，重点关注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以明确推进新职业群体市民化的重点。从理论上说，不稳定的就业状况对于新职业群体的市民化有负面影响。相应地，收入低、缺少正式劳动合同保障、缺少社会保险、失业预期高均会对新职业群体市民化产生负面影响。据此，本文分别提出以下四个研究假设：

- 假设 1：骑手的收入越高，其留在当前城市的可能性越高；
- 假设 2：签订劳动合同的骑手比未签者留在当前城市的可能性高；
- 假设 3：骑手的社会保险越完备，其留在当前城市的可能性越高；
- 假设 4：骑手的失业预期越低，其留在当前城市的可能性越高。

以上四个研究假设有助于进一步明确不稳定就业的各个维度在市民化过程中产生的独立影响。假设 1、假设 2 和假设 3 侧重骑手客观的就业特征，涉及收入、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等维度，而假设 4 反映的是骑手对自己就业前景的综合性判断。从总体上说，就业稳定性越高，骑手留在当前城市的可能性必然也越高。不过，结合骑手的工作特征，就业稳定性不同维度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例如，收入较高的骑手固然能够更好地承担城市生活的高成本，但本质上是“计件制”的高收入并不稳定，其对市民化倾向的影响可能较为有限。因此，尽管对于职业稳定性与市民化关系的总体性论断争议不大，但上述四个假设却未必都能得到数据支持，仍旧需要通过实证数据分析加以检验和分辨。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数据和样本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全国新职业青年调查”，该调查由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共同组织实施。该调查于 2020 年 10 月组织实施，调查对象为来自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 18~45 岁的新职业青年，经过数据清理后，共获得有效样本 11495 个，其中目前主要职业为网约配送员（骑手）的样本有 6196 个，占比 53.9%。本文以目前不在家乡的骑手为研究对象，在删除分析变量有缺失的样本后，最终分析样本为 3652 个。

目前不在家乡的骑手群体既包括农业户籍人员，也包括非农户籍人员。

我国自2014年起逐步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在分析中排除非农户籍人员将遗漏一部分实际生活在农村但属于非农业户口(或居民户口)的人员,也不利于从整体上理解骑手群体定居城市的意愿。从样本结构看,在非本地户籍骑手中,农业户口者占比75.85%,非农业户口者占比24.15%。若将分析对象进一步限定为农业户口骑手,则会忽略近四分之一的城市外来骑手群体,不利于全面理解这一群体的城市定居意愿。

(二) 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市民化倾向。调查问卷询问了受访者未来返回家乡工作的可能性,选项区分为“很有可能”“有可能”“不太可能”“完全不可能”四个等级。本文以此测量骑手的市民化倾向,返回家乡工作可能性越高,其市民化的可能性越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返回家乡工作并不意味着回到农村务农,也可能是返回家乡城市就业,但在就业驱动的城镇化视角下,这些返乡骑手在家乡城市将更加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骑手跨省、跨市流动到其他城市就业是市场调节下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他们也是未来城镇化的重点吸纳对象。因此,骑手能否在当前就业城市定居仍旧是衡量其市民化倾向的重要指标。

本文的自变量有四个。一是平均月收入,本文区分为五个等级:2000元以下、2000~3999元、4000~5999元、6000~7999元、8000元及以上。二是劳动合同,本文区分为三类:(1)签订劳动合同,包括与“人力服务商/第三方机构”和“现单位或雇主”两类对象签订劳动合同,在现行劳动法律体系下,这两类合同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被确认为存在劳动关系;(2)与平台签订合同,这类合同在当前司法实践中一般难以确认为劳动关系,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在法律意义上没有实质差异,但反映了骑手在主观认知上的差异;(3)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三是社会保障完备性,调查中询问了受访者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等四类保险的获得情况。四是失业预期,调查中询问了受访者“认为自己在未来6个月内失业的可能性有多大”,分为“完全不可能”、“不太可能”、“有可能”和“完全有可能”四类。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政治面貌、户籍、民族、健康状况、城市类型、主观经济地位评价(十级)、平均每周工作时长等。变量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从描述统计结果看,骑手群体的市民化倾向不高,表示“完全不可能”或“不太可能”留在当前城市的比例高达70.90%。在平均月收入方面,以“4000~5999元”为中心呈现正态分布,月收入低于2000元或高于8000元的占比较少,绝大部分集中在2000~7999元。在劳动合同方面,大部分骑手签订了劳动合同,对于没有签订劳

动合同的骑手，大部分人（32.23%）认为自己是与平台签订了合同，而不是没有签订合同。在社会保障方面，近半数的骑手有医疗保险或工伤保险，仅有两成左右的骑手有养老保险或失业保险，说明骑手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在失业预期方面，骑手群体两极分化严重，认为有可能失业的和认为不太可能失业的占比大体相当。关于骑手群体的描述统计表明，不仅是新职业群体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其中的某个职业类别，如骑手群体，同样具有很强的异质性。

表1 变量描述统计（N=3652）

变量	变量定义	统计值	变量	变量定义	统计值	
市民化倾向 (百分比)			性别 (百分比)			
	完全不可能	34.97		男	90.28	
	不太可能	35.92	女	9.72		
	有可能	21.25	婚姻状况 (百分比)			
很有可能	7.86	未婚或同居		44.80		
平均月收入 (百分比)				初婚有配偶	46.16	
	2000元以下	4.60		再婚有配偶	3.37	
	2000~3999元	23.17		离婚	4.93	
	4000~5999元	41.78		丧偶	0.74	
	6000~7999元	21.85	政治面貌 (百分比)			
8000元及以上	8.60	群众		54.08		
劳动合同 (百分比)				中共党员	7.50	
	签订劳动合同	62.70		共青团员	26.07	
	与平台签订合同	32.23		其他	12.35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5.07	户籍 (百分比)			
养老保险 (百分比)					非农业户口	24.15
	没有	73.82		农业户口	75.85	
	有	26.18	民族 (百分比)			
医疗保险 (百分比)					汉族	93.87
	没有	56.65			少数民族	6.13
	有	43.35	健康状况 (百分比)			

续表

变量	变量定义	统计值	变量	变量定义	统计值
失业保险 (百分比)				比较差	11.88
	没有	80.31		不好不坏	37.24
	有	19.69		比较好	50.88
工伤保险 (百分比)			城市类型 (百分比)		
	没有	56.05		一线城市	14.65
	有	43.95		非一线城市	85.35
失业预期 (百分比)			年龄 (平均值)		27.19
	完全不可能	15.01	受教育年限 (平均值)		11.62
	不太可能	32.94	主观经济地位评价 (平均值)		4.94
	有可能	28.53	平均每周工作时长 (平均值)		64.29
	完全有可能	23.52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序次 Logistic 回归模型估计自变量对市民化倾向的影响。序次 Logistic 方程利用了因变量取值的有序性,但对于各类别之间的相对距离不做任何假定,符合本研究因变量特征。

四、研究发现

以市民化倾向为因变量,加入全部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序次 Logistic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估计市民化倾向的序次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 (N = 3652)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自变量		
平均月收入 (参照组: 2000 元以下)		
2000 ~ 3999 元	0.245	0.165

续表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4000 ~ 5999 元	0.278	0.162
6000 ~ 7999 元	0.300	0.171
8000 元及以上	0.372	0.192
劳动合同 (参照组: 签订劳动合同)		
与平台签订合同	-0.192 ^{**}	0.069
没有签订合同	0.123	0.143
有养老保险 (参照组: 没有养老保险)	-0.159	0.103
有医疗保险 (参照组: 没有医疗保险)	-0.015	0.075
有失业保险 (参照组: 没有失业保险)	0.026	0.115
有工伤保险 (参照组: 没有工伤保险)	-0.011	0.070
失业预期 (参照组: 完全不可能)		
不太可能	-0.202 [*]	0.097
有可能	-0.490 ^{***}	0.101
完全有可能	-1.142 ^{***}	0.112
控制变量		
女性 (参照组: 男性)	0.751 ^{***}	0.109
年龄	0.008	0.004
受教育年限	0.026 [*]	0.011
婚姻状况 (参照组: 未婚或同居)		
初婚有配偶	0.063	0.070
再婚有配偶	-0.150	0.182
离婚	0.084	0.149
丧偶	0.225	0.386
政治面貌 (参照组: 群众)		
中共党员	-0.188	0.125
共青团员	-0.119	0.076
其他	0.057	0.098
农业户口 (参照组: 非农业户口)	-0.076	0.075
少数民族 (参照组: 汉族)	0.087	0.130
健康状况: (参照组: 比较差)		
不好不坏	0.188	0.105
比较好	0.118	0.105
一线城市 (参照组: 非一线城市)	-0.343 ^{***}	0.090
主观经济地位评价	-0.029 [*]	0.013

续表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平均每周工作时长	-0.005 ^{**}	0.002
其他参数		
切点 1	-0.594	0.299
切点 2	1.017	0.299
切点 3	2.649	0.303
Log likelihood	-4467.795	

注: * 代表 $p < 0.05$, ** 代表 $p < 0.01$, *** 代表 $p < 0.001$ 。

在收入方面,以月平均收入“2000元以下”的群体为参照组,依次增加的系数表明,收入越高的骑手,其市民化倾向越强。不过,与参照组相比,四个收入组的系数均不显著,假设1未得到支持,同时说明尽管工作收入对于留在就业城市有正向影响,但其影响程度也是十分有限的。例如,在综合考虑模型各项因素的情况下,与占比最高的“4000~5999元”收入组相比,“8000元及以上”收入组很有可能市民化的预测概率仅高出0.4%。可见,对于新职业群体而言,收入对于其市民化倾向的影响十分有限,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能够获得更高就业收入的城市,其落户难度和生活成本往往也更高。

在劳动合同方面,以“签订劳动合同”的骑手为参照组,“与平台签订合同”的骑手市民化的可能性更低($p = 0.005$),而“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骑手与“签订劳动合同”者无显著差异。如前所述,在当前的社会情境下,骑手与平台签订合同属于合作性质,并不属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合同,其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骑手的差别更多属于主观认知层面的差异,而非法律意义上的实质差别。考虑到认为自己“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骑手占比很低(5.07%),且很可能包括相当一部分将骑手作为过渡性就业方式的摩擦性失业人员,该群体的市民化倾向与“签订劳动合同”的群体未表现出显著差异。综上所述,除去少部分过渡就业的骑手,可以认为假设2得到了证实,签订劳动合同的骑手比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骑手有更强的市民化倾向。

在社会保障方面,养老、医疗、失业和工伤四类保险对于骑手的市民化倾向均无显著影响,假设3未得到支持。而且,从系数看,社会保障对于骑手市民化倾向的影响总体上呈负向,这意味着现有的社会保障难以有效起到提升新职业群体城市落户意愿的作用。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如果新职业群体所拥

有的医疗和养老保险的参保地非当前城市，那么社会保障反而会成为促使该群体离开当前城市的原因；二是劳动法律意义上的工伤保险以建立正式劳动关系为前提，但一些骑手会将按日缴纳的工伤意外保险视作工伤保险，因而保险的有无难以充分反映劳动者的保障状况，如送餐平台“饿了么”会自动从送餐员第一笔订单的服务费中扣除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和第三方责任保险的费用；^①三是新职业群体劳动者一般较为年轻，健康风险低，相较于完善的社会保障，该群体可能更加看重工作的稳定，亦即能否获得持续的收入。

在失业预期方面，与认为自己“完全不可能”失业的骑手相比，认为自己“不太可能”、“有可能”或“完全有可能”失业的骑手的市民化倾向均显著更弱。从系数看，随着失业预期可能性的提高，骑手城市化的可能性在下降，支持了假设4。例如，在综合考虑模型各项因素的情况下，预期自己“完全不可能”失业的骑手很可能留在当前城市的预测概率为27.10%，而预期自己“完全有可能”失业的预测概率仅为12.59%，前者留在当前城市的概率比后者高出1倍多。可见，失业预期对于新职业群体市民化倾向有很强的影响，对于城市新移民而言，有稳定的就业和收入预期才能适应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并长期居住。

以上是对本文四个核心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的分析，总体而言，假设1和假设3未得到数据证实，而假设2和假设4则得到了数据证实。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客观层面表现为劳动合同的就业稳定性，还是主观层面表现为失业预期的就业稳定性，对于当前新职业群体实现市民化均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收入和社会保障的影响则较弱。可见，与以往进城务工人员相比，尽管新职业群体的平均月收入较高，工作的灵活性也更强，但这并不会对其市民化过程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新职业与传统职业相比更强的灵活性以及更低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反而会对其市民化产生很强的不利影响。

最后，尽管并非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模型中一些控制变量对骑手市民化倾向的影响也十分值得关注，有待进一步研究。例如，从模型结果看，相比于男性骑手，女性骑手的市民化倾向显著更强。不过，从样本描述统计结果看，在骑手群体中，女性骑手仅占不到10%，可以认为目前骑手仍旧是较为典型的男性职业。因此，女性骑手较强的市民化意愿既可能是源于进城女性本身较强的市民化倾向，也可能是源于女性骑手群体的某些特质，其中具体的作用机制有待深入分析。又如，模型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主要就业特征和其他个体因素的影响后，与目前在非一线城市的骑手相比，一线城市的

^① 参见张成刚 《就业变革：数字商业与中国新就业形态》，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版，第61页。

骑手市民化的可能性显著更低。这反映出一线城市相对较高的就业收入无法抵消其更高的生活成本，也表明城市等级和城市差距亦成为影响我国城镇化的重要因素。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当前规模十分庞大的骑手群体为分析对象，分析了骑手收入、劳动合同、社会保障和失业预期四个方面的因素与其市民化可能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收入与社会保障对骑手群体的市民化倾向并没有十分显著的影响，这与以往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①当前对骑手群体市民化倾向影响最大的因素均与“狭义”的工作稳定性有关：是否通过订立劳动合同与雇主建立正式的劳动关系；是否对自己未来一段时间的就业状况有稳定的预期。鉴于以骑手为代表的大量新职业群体都具有收入较高、稳定性较差的职业特点，以上研究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骑手就业状况与市民化的关系，对于理解其他新职业群体的市民化状况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从广义上看，收入、社会保障、劳动合同和稳定的就业预期均是衡量就业稳定性的重要指标。^②但就工作稳定性对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影响而言，拥有正式的劳动合同和稳定的就业预期比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当前新职业群体的就业状况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尤其是以职业伤害保障为核心的社会保险建设问题。^③不过，如若将新职业群体放在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的宏观背景下考察，那么更加紧要的问题或许是改善新职业群体不稳定的就业状况。相比于更高的收入水平以及可以通过收入扣除实现的社会保障而言，新职业群体更稳定的就业预期是其在城市长期发展的基础，也是其成为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必要条件。

正如有学者指出，灵活、非正规的平台从业者在收入水平上有明显的提升，而且大多数平台经济的从业者是自愿选择这种就业方式，而非被迫。^④

① 参见梅建明、袁玉洁《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3375份农民工调研数据》，《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68~77页。

② 参见Arne L. Kalleberg, *Good Jobs, Bad Jobs: The Rise of Polarized and Precarious Employment Syst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0s-2000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1。

③ 参见王天玉《试点的价值：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的制度约束》，《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第51~60页。

④ 参见徐菁菁《面对“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或许不用太悲观》，《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第18期，第74~77页。

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收入高低对于新职业群体市民化倾向无显著影响，新职业群体较高的平均收入意味着其落户城市的收入限制已经大为减少。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何更高的收入未能显著提升新职业群体市民化的意愿。本文基于数据分析所得出的结论部分回应了上述疑问，简言之，新职业群体不稳定的就业状况影响了其定居城市的能力。对于流动人口而言，若想长期在城市中生活，必然面临着居住的问题，而无论是租房还是购房，不稳定的就业状况意味着不稳定的居住状况，进而限制了家庭化迁移的能力。这是因为只有在雇佣关系稳定的前提下，劳动者才能够签订长期租房合约或通过信贷的方式购房以实现城市定居。综上所述，推动新职业群体雇佣关系正规化是提升其就业稳定性和落户城市可能性的根本途径。

经济和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一系列新就业形态和新职业群体，然而无论是相关的就业者，还是规范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都难以迅速适应快速的社会变迁。例如，有研究表明，绝大部分（78.50%）骑手认为自己与送餐平台之间存在“雇主—雇员关系”，同时，绝大部分（81.31%）骑手也希望与送餐平台订立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会保险。^①可见，虽然骑手从事的是一种新的就业形态，但其对自己职业的看法更加倾向于雇员，而非个体经营者，而且从业者也希望获得更加完善的劳动保障，而非长期处于一种相对自由的就业状态。因此，基于现行的劳动法律框架体系，在充分理解新职业群体的工作特点和职业认知的基础上，研究并提出新职业群体的就业稳定对策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

从推进城镇化和共同富裕的角度看，本文研究表明，提升新职业群体落户城市的可能性需要从劳动合同与失业预期两方面入手。在客观的劳动合同订立方面，新职业群体雇佣正规化的核心困难在于用工方难以负担正式劳动关系所附带的社会保障成本。因此，探索适合新职业群体就业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新职业群体雇佣关系正规化，有助于提升新职业群体的就业稳定性。在主观的失业预期方面，签订劳动合同固然能够降低劳动者的失业预期，但更加根本的策略还是不断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就需要进一步推动城市群和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因为只有较大规模的劳动力市场才能提供更加充分、更加高质量的就业，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劳动者的就业安全感。

（责任编辑：温莹莹）

^① 参见邱婕 《灵活就业：数字经济浪潮下的人与社会》，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版，第88页。

Precarious Employment and the Citizenization of New Occupational Groups: A Study Based on Takeaway Riders

Tian Zhipeng

【Abstract】 The new business forms provide mor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migrant rural labors ,but their more flexible employment methods also pose potential challenges to China’s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from the Chinese New Occupational Youth Survey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ployment stability of takeaway rider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ir citizeniz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riders with labor contracts are more likely to be citizenized than those who have signed contracts with the platform , while income and social security have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ir citizenization tendency; the citizenization possibility of riders with low expected unemployment risk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ose with high expected risk.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a certainty of employmen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erfect security ,therefore promoting employment standardization and providing appropriate social security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possibility of citizenization of new occupational groups.

【Keywords】 new occupational groups; precarious employment; citizenization; takeaway riders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People – Centered 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Wang Wei Li Weichao

【Abstract】 As a sunrise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the cultural industry must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value in order to realize both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that is ,insist on replacing the “capital-centered” development logic with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ideas ,meet the “real needs” of the people’s pursuit of a better life and consciously abandon the inhibitory “false needs”. Only by upholding the “people-centered” valu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can we effectively avoid the trap of concealing the truth ,prevent people’s personality from being obliterated ,avoid the tragedy of people being materialized ,and eliminate the evil consequences of freedom being destroyed.

• 135 •